

“高陶事件”始末

沈 宁

抗日战争初期，日军扬言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可是开战一年多之后，中国军民的抵抗日益顽强，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梦想完全落空，于是日本政府改变策略，采取诱和攻势。1938年11月和12月，日本首相近卫两次发表声明，试探与中国和谈的可能性，均遭到蒋介石的严辞拒绝。可是汪精卫认为，不应放弃以和平方式解决中日争端的机会。于是日本陆军大佐影佐祯昭与中华民国外交部亚洲司接触，安排高宗武及董道宁密赴日本东京，与日本高级官员会晤，铺平了汪日上海会谈的道路。

1939年秋天，汪精卫带领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入，自重庆出走，经过河内，到达上海。我的外祖父陶希圣（有蒋介石“文胆”之称——编者注）跟随汪精卫离开重庆，但是滞留香港多时，犹豫不决，最后终于经不住汪精卫多次要求，也到上海参加中日谈判。

“和平谈判”只是表象

1939年11月1日，日本与汪精卫的谈判，在上海虹口六三花园正式开始。日方代表是影佐祯昭、犬养健等，汪方代表是陈公博、周佛海等。谈判会议上，日方分发《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草案》，要求汪方代表逐条讨论。草案条款广泛苛刻，远不同于以前双方协议以

及近卫声明的宗旨，双方10天开了7次会，并有多次会外私下商谈，日方毫不让步。后来谈判地点改到沪西愚园路1136弄60号继续，日方仍坚持强硬立场，胁迫汪方接受日方全部条款，并要求在年底签约。外祖父数次提出，因为身体不适，请求退出会议谈判，都被汪精卫婉言留住了。

汪日之间除《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之外，还有《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具体原则》、《秘密谅解事项》等八份文件。那些文件的条件非常苛刻，日本所要勒索的中国地域，从黑龙江直到海南岛；日本所要掠夺的中国物资，下至矿业，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从东南至西北，一切中国的权益，都要让日本持有或控制。日本是要吞并中国，灭亡中国，中日之间断无和平可言。于是外祖父有了逃离上海，脱离汪精卫的念头。他写信去香港，要家人来上海团聚，可以让他从愚园路搬出来，躲开汪精卫的视线。外祖母一家到了上海，在环龙路租了房子，外祖父搬来，有了一点自由空间。

计划逃离

作为国民政府的外交新星，高宗武本来跟周佛海一起策划，最早把汪精卫

“和平运动”的想法提交给日本方面。但从跟随汪精卫到了上海以后，高宗武与周佛海就是是否需要到南京建立新政权，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周佛海对汪精卫的影响，高宗武便开始被疏远起来，很多重大事件也不再找他商量。因此高宗武就有了退出的想法，对“和平运动”也不再热心了。

1939年12月26日晚，人们还在热烈庆祝圣诞之中。汪精卫召集汪方全体人员，听取谈判报告，审查全部文件，然后宣布谈判结束，全部接受日方条件，定在12月30日签字。外祖父立刻明白了，如果不签字，只有死在上海。但如果他在日汪密约上签字，就做了卖国的汉奸，比死更可怕。

回到家里，外祖父闷声不响，垂头丧气。下午3点多钟，高宗武突然到外祖父家来，两人关了门密谈。外祖父告诉高宗武：我听说，他们早已监视你，现在你有生命危险。高宗武说：我们走了吧。外祖父说：我有几个学生很亲近，靠得住，能帮忙接应。高宗武说：我发求救电报给香港的亲戚。外祖父说：我想最好能请杜月笙先生帮忙，我跟他有一面之交，估计他会伸援手。高宗武说：杜先生也在香港，我这就去办。外祖父说：小心，小心。

当时中国还有些人，对日本人仍然抱有幻想，国际上也有不少人认为，日本并没有完全灭亡中国的意图。如果高宗武和外祖父两人把日汪密约公布于世，天下人便都看明白了日本完全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那么中国人民抗战的意志会更坚强，国际上也会更加支持中国抗战。外祖父想，如果他们这样做，能对国人敲响警钟，唤起警觉，也算将功补过。但当时情势，外祖父顾不得考虑日后被重庆政府如何处置，他只想逃出上海，逃离在日汪密约上签字的危机。

揭发日汪密约

12月27日，外祖父开始称病在家，

序与跋



盲人钢琴调律师陈燕笔下的猫

我的早晨从5点开始，而冬天未尽的窗外还满是黑暗，我从床下摸出手机，手指一按，世界亮了。这个时候，不知道陈燕在做什么，她说她每天凌晨3点就醒了。

人是恐惧黑暗的，可是陈燕看了40年黑暗，全黑里的疼痛没人知道，只有她在独自打磨，40年过去，连疼痛都有了一种令人感慨的光泽。

陈燕画画，在宣纸上挥毫泼墨，我不知道她靠什么来揣摩毛笔上色彩的深浅，我没问过。她会把她画的画拍下来通过微信发给我，然后问：“行吗？”这试探的问话里是期待有忐忑有深意的，我说：“荷花的叶子可以再生动一些。”然后她再画，再问：“这次呢？”其实对于一幅画，我们心里有各自的期待。就像她问我，蓝天的蓝和海的蓝到底有什么区别？当你把一个颜色解读到最后，词汇是穷尽的，又该怎么描述，黑暗对蓝色的想象？

我很喜欢陈燕画的猫，最普通的黄毛狸猫。她从小一直摸着猫的姿态，时间长了心里就有了细致的轮廓，你怎么也难想象那是出自盲人的笔下。她画画的时候会扔出几块小瓷片，啪啪啪地飞出，如同暗器落在宣纸上，这些小瓷片，就是她纸上定位的标识。陈燕左手在纸上摩挲着，右手里已经着墨的笔下开始有了猫的痕迹。陈燕用同样的方式抚摸生活，久了，黑暗中有了扎实的城堡。

不去愚园路开会。汪精卫不放心，派了两个医生来家里给外祖父检查身体。他们查不出具体的毛病，但看到外祖父确实精神萎靡，报告汪精卫允许外祖父在家多休养几天。12月30日双方签署密约，外祖父没有到场，所以没有签字。1940年元旦，外祖父必须到愚园路去拜年。到汪府进门刚坐下，陈璧君就要他补签密约。外祖父以病婉拒，幸亏汪精卫刚好下楼来，说：此刻不必勉强，过几日病好了再补不妨。

外祖父回家后，派母亲出门，单身一个，摆脱特务的跟踪监视，跑到高宗武家，递交一信，说明自己必须立刻脱离上海的决心，已经与香港杜月笙联络过了。高宗武请母亲带回复信，说明他将立刻着手，对日汪密约照相，以备带到香港，公诸于报端。

1940年元旦前后几日，外祖父和家人，在生死线上焦虑徘徊，等待香港通知。那不是一场儿戏，上海由日军占领，戒备森严，高宗武和陶希圣两人又属汪方高层，日汪特务日夜紧密监视，且不说能否出走成功，连事先保密都很难周全。1月3日，外祖父接获香港密报，立刻到南京路华懋饭店，有人接应。外祖父借口看朋友，两手空空，叫日汪派来监视他的车夫送到华懋饭店。当时的华懋饭店有9层楼高，很气派，没有多少人进出。外祖父下了车，从前门走进去，穿过门厅，走到后门，迅速穿出，飞奔到马路边，坐进街边一部计程汽车，疾驰十六铺码头。

那里的接应人员把外祖父领入船舱，紧闭舱门。不多时，轮船起锚，外祖父总算安全逃离上海。到达香港之后，外祖父和高宗武一起，联名在香港《大公报》公布了日汪密约全文，向世界揭露日寇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激发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

这就是史称的“高陶事件”。（本文选自《半记：一个家族的抗战史》，有删节，该书已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于2015年4月出版）

王小柔

最美的枝条依然向着东方

自始至终，我也无法把陈燕和“盲人”这个词汇放在一起。她超常的记忆力和听力已经在黑暗边界开疆拓土，变得像雷达一样敏锐准确。一个七拐八绕的陌生地方，我拿着地图都找不到路，但她只要走过，就能找回去。她一边引领着我，一边轻易说出路两旁的商店和建筑，我大惊，她得意地说：“你边走边说，对于你也许是闲聊，但你说过的话，走过的路我全记在心里了。”陈燕，就是这么给自己人生导航的，我相信她的心里能看到。

耳边的世界很大，大到荒凉。你总是要用更多的内容去填充它，因为空旷让人恐惧。陈燕选择了钢琴。她的琴房里摆满了她亲手选来的钢琴，每台音色都不同。钢琴是她的朋友，她要为他们找到各自的知音。在这间琴房里，常常会来很多学琴的孩子，希望陈燕帮他们选一台好琴，陈燕一定要摸着他们的手形，按照孩子的性格来找到与他们匹配的钢琴。她能在这里从天亮待到天黑，每台琴前面坐一个曲子的时间，音乐就填满了一天。

地上的一片积水，能让她突然整个人重重摔在地上，她一边爬起来，一边说：“看不见，总是要摔跌的。”这句自我安慰的话，从一出生不知被她重复了多少遍。如同一剂中药，在老病号的灶台上总是要咕嘟咕嘟地熬着，把苦都熬出来，才能治病。陈燕咽下一碗又一碗的苦，并告诉自己，多喝下一碗就离健康近了一步。生活里，总会苦尽甘来的。

跟陈燕聊天时，她常常说自己“看见”了什么，其实我知道，陈燕口中的“看见”其实是“听见”。岁月摇啊摇啊，黑暗里她依然笃定地信任着人间的美好。我认识陈燕的时间并不长，才一年。在很多人眼里，她是励志人物，她是中国第一位盲人钢琴调律师，她是导盲犬畅行的发起者，她是作家。在我的感知里，她是一棵大树，无论环境是否恶劣，根紧紧抓着泥土，最美的枝条依然向着东方。

（本文为陈燕著《听见：陈燕的调律人生》一书的序，有删节，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15年5月出版）

《1948：天地玄黄》

这是一本关于1948年的书，其描述的对象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两个时代，一个将亡未亡，一个将生未生，经过殊死搏斗，作为最后选择的结果，是1949年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钱理群正是围绕在“新中国”与“旧中国”生死大决战时刻，各类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而发生的极其复杂也极其丰富的社会、思想、文化、心理现象展开论述。该书可看作是一部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

（钱理群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5月出版）

《此心安处是吾乡》

本书是季羡林1946年至1947年，从德国回到祖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在北大组建东语系这一时期生活、工作、社会交往的原始材料。先生生前发表的一些怀念性文章中提到的一些人与事，比如与陈寅恪、胡适、汤用彤、梁实秋等人的交往，在这本日记中都可得到印证。虽然只是短短一年多时间的日记，但涵盖了多方面内容，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更鲜活、有趣的国学大师。

（季羡林 著 重庆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

《我们应有的反思》

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从事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文化史等方面研究，著有《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西汉人口地理》等著作。本书为其思想随笔集。作者年近七十，直面问题，以省思和追问警醒国人。全书以编年的形式，精选作者30余年间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或学术前沿，或畅谈文化，或分析历史迷局，或探讨社会热点，无论何种文字，都带着强烈的思辨精神与深厚的人文关怀，从酣畅犀利中显出学者情怀。

（葛剑雄 著 中信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

《隐形将军韩练成》

本书讲述了一位传奇军人，被誉为“神秘人物”的爱国将领韩练成（1909—1984）的戎马一生。他曾是蒋介石的参谋，与冯玉祥一起参加北伐战争；抗战期间，率部抗击日寇于昆仑关、桂林、雷州半岛等地；莱芜战役里扭转华东局面，在解放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如今，同为宁夏人的宁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薛正昌通过搜集各方史料，展现了韩练成从“侍从参谋”到“共和国中将”的历程。

（薛正昌 著 商务印书馆2015年5月出版）

《我们这个时代的怕和爱》

莎士比亚说，我们命运遇到这样的时代。时代高歌猛进，却并不全然美好。面对当下略显浮躁的社会氛围，有那么一群人用自己的方式回应时代。本书中，由“80后”“90后”的编辑、记者发问，就自己的疑惑、迷茫与文艺评论家及画家陈丹青、作家野夫、台湾大学教授齐邦媛等文艺界知名人士探讨，以此思索时代、审视时代，希望能为年轻一代答疑解惑。

（陈丹青等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

《格特鲁德·斯坦因评传》

她是毕加索的伯乐和挚友，海明威的文学导师和宿敌；她在毕加索为其所画的肖像下创作出具有绝对先锋意义的文学作品；她创立的花园街27号沙龙成为无数名人向往的艺术圣地。她就是格特鲁德·斯坦因，20世纪现代主义先锋人物。一战后的美国文学流派“迷惘的一代”，正是源于格特鲁德·斯坦因对海明威的评价。这本评传既不缺乏逸闻趣事，又没有止步于此，而是深入到斯坦因文学创作的肌体之中，通过细致的文本解读和颇具思辨性的理论分析，将斯坦因复杂的内心世界和无所畏惧的实验精神充分彰显。

（〔英〕露西·丹妮尔 著 漓江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

